

文史资料选辑

第 一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发刊词 (1)

七七事变纪实

..... 何基沣 邓哲熙 戈定远 王式九 吴锡祺(1)

二十九军和冀察政权 戈定远(25)

韩、石叛冯和阎、冯联合反蒋的经过 邓哲熙(34)

一九三七年访问英、德和苏联的回忆 翁文灏(44)

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一件投降阴谋活动 施乐渠(51)

晋军概况和“铁军”、“同志会”的内幕 楚溪春(54)

关于改组派的一鳞半爪 罗方中(64)

有关民国初年政史的见闻纪实 梁漱溟(69)

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记 金汉鼎(80)

清末赎回京汉铁路的经过 叶恭绰(101)

洪宪遗闻 张国淦(108)

补充·订正·质疑

对《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一件投降阴谋活动》一文的

意见 阎宝航(122)

附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工作办法 (12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征集文史资料参考题目 (125)

附注

对《洪宪遗闻》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一辑

七七事变纪实

何基津 邓哲熙 戈定远 王式九 吴锡祺

日本帝国主义者自从一九三一年以武力侵占我东北三省,又在一九三三年以武力侵占我热河省以后,暂时改变了对我国的侵略方式。它一方面利用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屈辱外交,先后签订了《塘沽协定》^①和《何梅协定》^②,以攫取我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的主权;另一方面,积极扶植汉奸亲日派进行拼凑伪组织的

① 一九三三年二月底日寇侵占热河后,又大举进攻长城各口,我国驻长城沿线各部队曾进行抵抗。但由于蒋介石忙于进行“剿共”内战,不派主力部队北上援助,不久,日寇经滦东等地进逼平津。何应钦与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遵照蒋介石指示,派熊斌于五月三十一日和日方代表冈村宁次签订《停战协定》五款于塘沽。根据这一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占有东三省及热河省,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的地区,并且把整个华北都置于日军监视之下,为日本进一步控制华北、策动华北“特殊化”准备条件。

②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及日本大使馆武官高桥,以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侵入非武装区域、破坏《塘沽协定》为借口,向国民党政府要求华北的统治权,并由东北调遣大军入关,威胁平津。六月九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正式向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强硬《觉书》。何应钦根据国民党中央电令,于七月六日复函梅津,全部承认日本要求。这个协定规定取消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省的中央宪兵、中央军和东北军,撤换河北省主席和平津两市市长,撤销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取消河北省的反日活动。这个协定为后来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等一系列的丧权辱国事件扫清了道路。

活动,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唆使汉奸殷汝耕成立了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便把这一地区完全地、直接地控制在它的掌握之内。

在《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签订之后,特别是冀东伪组织出现以后,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已经一步步地走向所谓“特殊化”。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并不以此为满足,它还要进一步使“特殊化”的范围不断扩大,“特殊化”的程度不断加深。正在这个时候,萧振瀛经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同意,进行了倒黄(黄郛)拥宋的活动。

宋哲元在任察哈尔省主席期间,由于日寇的挑衅行为,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间发生了察东事件(详附录一),同年六月间又发生了张北事件(详附录二)。在亲日派何应钦之流看来,宋哲元如果继续主持察政,对于贯彻他们的屈辱外交政策是极为不利的。当时何应钦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在张北事件发生后,日寇有意将问题扩大,何为谋解决这一问题,曾赴南京商讨对策,并向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建议,以宋在察省不断与日人发生摩擦,迟早终须易人,与其待日人提出而被动地撤换,不如由我主动撤换为宜。汪接受了这个建议,于六月十九日下令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职务,所遗察省主席一职,由察省民政厅厅长秦德纯暂行代理,同时,并准备将二十九军调离华北,以免与日寇发生冲突。宋事前对此毫无所闻,以事出意料,得悉之后,颇为愕然,当立即于二十日离张家口返回天津寓所。宋到津后不数日,蒋介石电召宋去重庆(蒋这时在四川视察)。宋因免职事对南京颇怀怨望,故称病不往。

萧振瀛是一个颇有野心的政客,由于他对二十九军的建立和发展曾经出过力,故深得宋哲元的信任。这时,他正营谋在华北取得一个市长的位置(他的目的是北平市或天津市),宋既被免去察省主席职务,而二十九军又将撤离华北,这就直接影响了他的活动。他希望二十九军留在华北不动,但又不能违抗南京的命

令。适于此时,在六月二十八日,北平城突然遭到汉奸白坚武便衣队的袭击(详附录三),引起了北平当局的惊慌失措。萧振瀛乃立即抓住这个时机,利用他的北平军分会委员的身份,以北平兵力单薄、防务空虚为词,向军分会建议将二十九军之一部移驻北平,以巩固城防。经军分会负责人鲍文樾同意后^①,萧即以电话通知了张家口二十九军军部。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得到开拔命令后,立即以紧急行军的动作,在数小时内就由察省开驻北平四郊,控制了北平市。萧振瀛造成了这一既成事实之后,就为他的进一步展开在华北的活动准备了有利的条件。但是,他又意识到,由《何梅协定》造成的华北驻军的限制,如果不与日本方面妥协,二十九军在华北仍然是站不住脚的。于是他就采取了假借日寇驻华北军人的声势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的手法,借以为宋哲元要求更高的名义,为二十九军索取更大的地盘。他一方面径电蒋介石,申说日寇内侵,因见二十九军拚命抵抗,有所顾忌,才肯停战,如将军队撤走,华北岂不断送;并说黄郛甘心卖国,绝不容许,要保华北,必去黄郛。另一方面,他又由汉奸陈觉生的介绍,在天津与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及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取得联系,说明前此相见以兵,彼此均系执行国家任务,现既签约言和,便当蠲弃前嫌,化敌为友;并说,黄郛不过是一个空头政客,遭到军人反对,他亦不能解决问题。日方亦知拉一黄郛,于事无济,不如利用宋、萧作为其统治华北的工具,遂同意支持萧的主张。

蒋介石闻宋、萧有联日活动,即派亲日分子张群以“局部妥协,不如全面妥协”为词,游说日本驻华大使有吉,要求日方压迫

^① 这时何应钦已与日寇签订了《何梅协定》,回到了南京,国民党政府派驻华北的部队、蒋介石维持其统治的工具——中央军黄杰部第二师、关麟征部第二十五师已撤离了北平;曾扩情主持的北平军分会政训处、蒋孝先部宪兵第三团和河北省及平津两市的国民党省市党部等,也都随之撤出了华北;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均被撤职;东北军于学忠部五十一军也被迫撤离平津;北平军分会由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代行。

宋、萧接受撤军的命令。萧得此消息后，立即找酒井、土肥原要他们警告有吉拒绝张群。有吉接到警告后，即不再与张群见面。蒋见计不获售，乃又派何应钦带同熊式辉、陈仪分途北上。何、熊先到北平，陈取道天津，向日驻屯军联系，仍企图实现张群的计划，又遭日军拒绝，不得已始由熊式辉、陈仪同往会晤宋、萧。萧对熊、陈表示：“黄郛不去，一切都谈不到”，并说：“中央如能相信我们，我们就可支撑这个危局，决心死守华北，一切听命中央。”同时，萧并建议改组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宋哲元代替黄郛为委员长，并按照该会原来建制，辖华北五省三市。熊等看到势已至此，别无解决途径，乃携萧方案向何复命，经何请示蒋介石后，缩小范围，只辖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并更名为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命宋哲元为委员长。同时并任命宋哲元兼河北省主席，张自忠为察哈尔省主席，秦德纯为北平市市长，萧振瀛为天津市市长（后萧被宋免职，天津市长由张自忠接替，刘汝明接替察省主席；以后宋又让出河北省主席，由冯治安接替）。

冀察政委会虽然在名义上仍然隶属于南京国民党政府，但是，用人行政的权利完全掌握在宋的手里。在财政方面，关税、盐税、统税和铁路等收入，也完全由冀察政委会截留支配，并且用这些收入来扩充军队，购买军械，实质上已经成了变相的自治。事后曾有人问萧：“华北情况复杂而危险，绝非长治久安之局，你们造成这个局面的目的究竟何在？”萧答：“我们的目的是名利双收，有了地盘，大家就有官可作，有财可发，这就是利；如果日本人压迫我们，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就起来抗战，这就是名。”冀察政委会就是在这样投机取巧、行险侥幸的思想支配下产生的。

冀察政委会既然是在当时内外矛盾复杂交错情况下的产物，因此冀察政委会的本身和宋哲元的思想和行动也就表现了各种矛盾。表现在对外关系上，宋哲元对日寇的态度，是既有妥协的成分，又有不妥协的成分。他的对付日寇的办法，是“表面亲善，实际敷衍，绝不屈服”；他的口号是“不说硬话，不做软事”。他对

依附于日寇的汉奸亲日派,是既不倚重他们,又不得罪他们,而是用羁縻笼络的办法,防止他们捣乱。表现在对内关系上,他对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态度,是既要保持隶属的关系,又要行使自治的实权,而一旦遇到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时,便又推到南京去解决。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虽然一贯反共,但不赞成“剿共”,他的看法是,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成不了大事,但主张“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杀中国人”。他对于在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虽不表示反对,不主张对游行的学生采取血腥镇压的办法,但也不同意在冀察范围内举行游行示威,认为游行示威不能救国,反而会招来麻烦。因此,他最初对学生游行示威也曾采取过捕人、打散等方式,但不久就转变为包围封锁和派人劝导的方式。

宋哲元的思想情况,始终是矛盾的、动摇的。当然,他的这种态度也就遭到了日寇的极大不满,认为他没有与日本亲善合作的诚意。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冀察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就是向日寇投降,要么就是与日寇决裂,敷衍是行不通的,更是不能持久的。

当时的矛盾情况也反映到冀察政委会内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一小撮汉奸亲日派,如齐燮元、潘毓桂、张璧、陈觉生等人,在日寇的唆使下,尽力使冀察进一步地伪化,并且挑拨、分化二十九军内部的关系,从二十九军上层寻找可被利用的对象,作为效忠日寇主子的资本。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二十九军绝大多数官兵都是有爱国思想的,特别是由于受到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他们都有着不愿意当亡国奴和抵抗日本侵略的情绪和要求。但是,其中又有程度上的不同。在上层人物中,有的人虽然也有爱国思想,也要抗日,但是他们又留恋于个人的名誉地位,他们的抗战意志并不坚决。惟有二十九军的中下层,抗日情绪的表现最为明显,他们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在日寇面前从来没有表示过畏缩和退让,他们曾经和日本军队发生过不少次大大小小的冲突。

总的说来,冀察这个局面,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个极其复杂、特殊的局面。它既不同于一般国民党的行政区域,又不同于当时在日寇卵翼下的冀东伪组织。因而它的政治态度和行动上的表现,有它一定的特点。

所有这一切,正是冀察当局在七七事变发生后,对抗战问题摇摆不定,终至因循坐误,造成军事上重大失败的历史根源。

冀察政委会成立后不久,汉奸潘毓桂、张璧等在日寇的唆使下,拟出一个所谓“自治方案”和“自治政府”旗帜图样,送给宋哲元,宋看过后立即焚毁。日寇看到这条计策行不通,以后就着手进行经济上的压迫,陆续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经济方面的问题,如:修筑津石铁路(天津到石家庄)问题、开发龙烟铁矿问题、修改海关税则问题、开辟航空线路问题、收购华北棉花问题、长芦余盐出口问题,等等。宋对于这些问题,既不敢明确地拒绝日寇的要求,又不敢悍然地出卖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利益,于是就采取了敷衍推诿的办法。首先是拖,到实在拖不下去的时候,就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请示,借以减轻自己的责任。如对长芦余盐出口问题,就是经过南京财政部批准的。有的问题是采取了拖延的办法。如对于设立航空公司的问题,经过长时期的反复磋商,才委派了张允荣为“惠通航空公司”的总经理,负责筹备工作。直至七七事变发生,该公司并未正式开办。在收购棉花问题上,还引起了日寇的不满。日寇企图在压低收购价格的情况下,对华北棉花实行垄断。当时天津商品检验局向宋建议发放大量棉农贷款,以抵制日寇的贱价收购。这对于日寇的垄断政策,当然是不利的。此外,如开矿、修路等问题,因关系更为重大,都是一再推说须向南京请示后方能进行。以上这些问题,均系日寇以口头向宋提出而进行商议的。宋对这些问题,是在既不敢拒绝、又不能同意的情况下,以模棱两可的态度把问题摆在那里。而日寇的企图是不达目的不止的,宋的这种做法,招致了日寇的责难。于是在一九三七年三月间,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向宋提出了书面

的所谓“经济提携”的条款。

当时日寇向宋提出这个条款的经过是这样的：某天，汉奸陈觉生来见宋，谓田代司令官邀宋赴宴，但并未说明商谈任何问题，宋即偕陈前往。宋到后，田代已预先备妥缮就的“经济提携”条款，请宋签字。宋看到当时情形已成实逼，处此情势，于是就在这个条款上签了字。宋归后，在接见他的高级将领和幕僚时，神色异常，心情沉重。他说：“我们负有军事责任的人，今后如赴日方的邀约，必须预先作好发生意外由何人来接替任务的准备，以免遭到要挟。”并说：“日本人提出这个条款，在被迫的情况下签字，是完全无效的，我们对付的方法，就是拖而不办。”宋当时并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报告了这一事实的经过。这个所谓“经济提携”的主要内容，都是过去已经提出过的问题，即修路、开矿、关税、通航和收购棉花等问题。这次日寇提出的目的，就是把问题用书面的形式使之条约化，迫使冀察当局不得不履行这个条约。条款提出之后，日寇即不断地逼促实现，特别是对修路、开矿两个问题催促更急。宋不敢自作主张，即派戈定远向蒋介石请示。蒋的答复是：“如万不得已时，矿可开，路不能修。”第二次又派李思浩前往见蒋，蒋的答复仍然是：“矿可开，路不能修。”宋因无法应付日寇的要求，而日寇对宋又愈逼愈紧。于是在穷于应付的情况下，宋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一日避往山东乐陵原籍，借以拖延一时，徐图应付之策。

二

在冀察政委会成立后，日寇对冀察当局不仅实行以上的压迫，而且在军事上也实行步步进逼。一九三五年冬，日寇指使刘桂堂匪部由察东向河北省窜扰，企图在房山县一带建立盘据的据点，以威胁北平的安全。经我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何基沣旅击溃，向南逃窜。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日寇步兵一个中队在丰台演

习,在中途与我军相遇,因让路发生争执,遂起冲突。经双方派员前往调停结果,我驻军由丰台撤出。事态虽未扩大,但日军竟以此为借口,增兵进驻丰台,并且进一步要求在丰台至卢沟桥的中间地带修筑营房及机场,均被拒绝。一九三七年二月,日寇又指挥冀东“民团”宁雨时部三千余人,企图通过昌平、南口之线向西活动,又由我三十七师何基沣旅包围歼灭,并捉获日人三名,供出他们企图包围北平西面和北面的阴谋。

在七七事变发生以前,北平外围的形势是:北宁路沿线,西起丰台,东至山海关,均有日寇军队驻防;北平的东面,有完全听命于日寇的冀东伪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平的北面有在热河省集结的敌伪军;在西北面,有日寇收买的李守信和王英等土匪队伍。仅有北平的西南面,尚为我二十九军部队所防守。

当时,北宁铁路沿线既为日寇所控制,而位置在平汉路的卢沟桥就成了北平的唯一门户。在军事上,我军掌握了这个据点,就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而一旦为敌人所掌握,则北平就变成了一个孤立无援的死城。所以卢沟桥这一战略据点,就成为军事上必争之地。

日寇在当时的企图是:伺机占领卢沟桥,截断平汉路,使北平陷入四面包围的形势,以便加深冀察的“特殊化”,然后以平、津作为后方,进一步发动大规模的军事侵略。

这时,二十九军共辖四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和一个特务旅,并且把地方保安部队编成两个保安旅,作为正规军训练使用,总兵力不下十万人,分驻于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各部队驻防的位置是:一四三师刘汝明部驻察哈尔省及平绥铁路沿线(河北省境内)。一三二师赵登禹部驻河北省任丘、河间一带。三十八师张自忠部驻天津附近韩柳墅、小站、廊坊、马厂和大沽各地,并以一部驻南苑。三十七师冯治安部,师部驻西苑;何基沣旅驻西苑、八宝山、卢沟桥和长辛店一带,刘自珍旅驻北平城内,陈春荣旅驻保定、大名等地。二十九军特务旅孙玉田部驻南苑,以一团驻城

内。骑兵第九师郑大章部，师部和骑兵一团驻南苑，其余两团分驻固安、易县等地。石友三和阮玄武的两个保安旅，分驻于黄寺和北苑。

由于宋哲元一贯抱着与日寇相安无事、维持现状的幻想，在军事上始终处于毫无戒备的状态。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早已在《田中奏折》中确定了灭亡中国的国策，并且于一九三六年八月间，在日本首脑集团会议上又通过了一个叫作“基本国策”的文件。其中指出日本的意向是：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新的进攻，并且很快地就实行了国家规模的战时动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日寇对冀察的压迫也就一天比一天加紧。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以后，建立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鉴于冀察形势的严重，对二十九军上中层也积极进行抗日争取工作。当时二十九军内部有不少人与北平中共地下组织建立了工作联系，如三十七师旅长何基沣、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等，当时均与中共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积极推动二十九军抗击日寇。宋哲元这时的处境，一方面是日寇对他施加种种压力，一方面是人民以民族大义对他进行督促，虽然他对抗战并没有决心，但形势逼着他不能不作抗战的准备。有一天（时间约在一九三七年四五月间），宋召集幕僚研究对日的对策，并要参谋人员提出方案。二十九军参谋长张樾亭（与南京接近）根据国民党的主张，提出了一个“必要时撤出北平，保存实力，以待全国抗战”的方案。副参谋长张克侠即向中共组织报告了此事的经过，中共组织立即决定由张克侠出名提出了“以攻为守”的方案。其主要内容是：

（一）日本进占华北、进一步灭亡全中国的国策，早已确定（详《田中奏折》），现正大量调集军队，准备向华北进军，我们除了抗战与投降二者择取其一而外，别无他法可以挽救我军之危机，应付只能是暂时的，绝无法满足日寇之欲望。（二）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日寇进逼，中央（指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政府，下同）不管。

蒋介石并令关麟征、黄杰等部集结新乡一带，扼守黄河北岸，意在
与日寇夹击，消灭我军。如果我们撤退，将退到哪里去呢？黄河
以北既由中央军驻守，不会叫我军退到河南；山西的阎锡山向来
闭关自守，也不会让退到山西；绥远的傅作义也是如此。我军如
果撤出平津，只有在保定、石家庄平原地区挨打受气，军民怨恨，
后援不济，势必形成日寇、蒋军夹击之势，我军将不打自溃，这是
最危险不过的。（三）我军爱国教育，素不后人，抗日士气，极为高
涨。喜峰口之役，痛击日寇，被誉为抗战之民族英雄。现平津各
界及全国军民，均希望我们能奋起抗战，为国争光，此我军报国立
功之良机，决不可失。为今之计，不妨暂与日寇委婉应付，但必须
作积极抗战之准备，必要时以攻为守，一举攻占山海关，缩短防
线，扼守待援，号召全国军民奋起抗战，如此必能振奋士气，得到
全国人民之同情和支持。中央在全国军民愤激情况之下，决不敢
袖手旁观，不予支援，其夹击消灭我们之企图，必将不售。在我们
发动抗战后，只要能坚持一个时期，最后就是失败了也是我们的
胜利。如马占山在东北之抗战，十九路军之淞沪战役，虽败犹荣。
在全国人民支援之下，我们还有重整旗鼓之可能。如不此之图，
不战而退，必为全国军民所痛骂，将士离心，军心涣散，群情激愤，
后援无济，我军此时将退无可退，守无可守，战不能战，和不能和，
他人乘我之危，分化瓦解，将何以自存，此最危险不过之下策。

宋对此方案极表赞成，即命张克侠本此方案积极做抗战的准
备工作。张即根据中共组织的指示，提出了如下的建议：第一，加
强抗日思想教育。当时二十九军在南苑的军事教导团还讲授四
书五经一类的课程，张建议在此非常时期，应加强抗日思想教育和
国际时事教育。经宋同意，即聘张友渔（中共地下党员）和温健
公（进步教授）担任教导团教官，他们的讲课，受到学员的热烈欢
迎。同时，教导团内还有冯洪国、朱军（中共地下党员）等做组织
工作，所以当时南苑的抗日空气极为浓厚。此外，中共组织还发
动了一批进步的大学生（包括共产党员和党领导的民先队员）参

加了在西苑举办的军事集训。大学生军事集训由何基沣负责,何对学生讲话表示抗战决心,有时讲得声泪俱下,全体学生抗战情绪极为高涨。第二,加强情报工作。当时宋对敌情了解很少,张建议成立情报处,深入敌后,到东北、热河等地了解敌人兵力的部署及其动向。经宋同意后,即派靖任秋(中共地下党员)任情报处长,积极进行情报人员的派遣工作。第三,争取伪军反正。当时辽西、冀东、热河及察、绥等地,有不少伪军到处活动,有的还想乘机反正,应派人联系,积极争取。此项建议,亦得到宋的同意。

所有以上这些措施,还是宋到冀察后第一次采取的在政治上、军事上有积极作用的活动。后来,宋在一个座谈会的场合,曾对他的将领和幕僚表示:“我们要好好地训练队伍,充实力量,加强装备,等到国际战争爆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一支兵力由察省向热河出击,拊敌侧背,以主力从正面打出山海关,收复东北失地,我们要在那里竖起一座高高的纪念碑。”宋之所以发出这样的豪言壮语,并不是无因的。惜为时已晚,不久七七事变发生,原计划即被打乱。

中共北平地下组织争取二十九军积极抗战的活动,除了通过二十九军内部人员直接地影响二十九军上层人物的抗战情绪外,并且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当时在中共领导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东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团体,时常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机,展开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工作。他们响亮地高呼“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的口号,对二十九军表示大力的支持。他们还经常乘着二十九军部队演习的机会(当时日寇驻东交民巷的部队经常出城进行示威性的演习,二十九军部队亦不示弱,就在日兵演习的第二天在原地演习),派代表前往慰问,并讲述抗日的重要意义。这些爱国青年的热情,更加激发了二十九军官兵的抗日情绪。

我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我国内部和平统一的实现,

我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空前高涨,使得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进行的分裂破坏活动遭到可耻的失败。但是它决不容许中国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它要断然地实行它的“国策”,迅速地发动对我国的全面的军事进攻。特别是当它得到了德、意法西斯主义者的支持以后,就越加暴露了它的法西斯主义者的疯狂面目。

华北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人民群众抗日救亡的呼声,也一天比一天激昂。

卢沟桥的战争终于爆发了。

这时,二十九军驻卢沟桥的部队为三十七师何基沣旅的吉星文团,另一团驻八宝山一带,旅长何基沣的指挥所设在西苑。

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日寇驻丰台部队要求通过宛平县城(县城在卢沟桥东端)到长辛店地区演习,我驻军不许,相持达十余小时,至晚始退去。七日我军接到报告说:日军今日出外演习,枪炮都配备了弹药,与往日情况不同。旅长何基沣当据以报告了正在保定的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并促其速返。冯立即赶回北平,听取了何基沣的情况报告,并与何布置了应战的准备。是日夜间,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十一时左右,忽有枪声数响发于宛平县城的东方,我城内守军当即加以严密的注意。夜十二时,日使馆武官松井以电话向我冀察当局声称:“有日本陆军一中队,顷间在卢沟桥演习,仿佛听见由驻宛平城内之军队发枪数响,致演习部队一时呈混乱现象,结果失落日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兵。”我方因其所称各点不近情理,显系别有企图,当即拒绝了他的要求。少顷,松井又来电话,声称,我方如不允许,彼方将以武力保卫前进,又为我方所拒绝。同时得报:谓日军对宛平县城已取包围形势。我军政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当与日方商定,双方立即派员前往调查阻止。我方所派为河北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宛平县长王冷斋、冀察政委会外交委员会专员林耕宇及冀察绥靖公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等三人,日方所派为冀察绥署顾问日人樱井、日军辅佐官寺平和秘书斋藤等三人,于八日晨

四时许到达宛平县署。寺平仍坚持日军入城搜索失兵,我方不许。正交涉间,忽闻东门外枪声大作,顷刻间,西门外大炮机枪声又起。我军为正当防卫,乃奋起抵抗。我二十九军司令部立即发出命令,命令前线官兵坚决抵抗,并有“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之语。在战斗开始不久,我平汉线的铁路桥及其附近龙王庙等处曾被敌人攻占,至八日下午,我军从长辛店以北及八宝山以南齐向敌人反攻,并与敌实行白刃战,复将铁路桥及龙王庙等处夺回。

二十九军官兵由于受到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北平各救亡团体慰劳和鼓励的影响,他们深刻地懂得了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当前最凶恶的敌人,不把这个敌人打败,全中国人民就有当亡国奴的危险。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中共地下组织即领导北平各界组织起北平各界抗战后援会,发动广大群众援助二十九军抗战,并派人与吉星文团取得联系,鼓励他们英勇抗战,益加增强了他们至死不退的决心。因此,我军官兵在劣势装备的不利条件下与敌作战,士气旺盛,人人皆以大无畏精神顽强抵抗,有不少受伤官兵坚持不下火线。某天夜间,敌人以坦克向我阵地冲来,我军以一连的兵力,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冲锋前进,终于将敌人的九辆坦克全部打退。附近居民看到自己的军队英勇杀敌,在中共领导下的各救亡团体的发动下,纷纷地冒着敌人的炮火,参加救护工作,把受伤官兵送到医院。送水、送饭、搬运弹药的群众,更是往来不绝。有的群众,看到我军伤兵,就感动得落下眼泪。长辛店铁路工人为了协助军队作战和固守宛平县城,很快地就在城墙做好了防空洞和枪眼。所有这些生动感人的事迹,益加振奋了前线的军心。

我军对日寇的坚决回击,是出乎日寇意料的。他们见势不妙,乃诡称失踪日兵业已寻获,向我方提出和平解决的要求(实际是缓兵之计)。经双方谈判,于十一日商定停战办法三项:(1)双方立即停止射击;(2)日军撤退到丰台,我军撤向卢沟桥以西;(3)

我方城内防务,除宛平原有保安队外,另由冀北保安队(即石友三部)派来一部协同担任城防。但在协议成立之后,日寇并未撤退,仍不时以炮兵轰击宛平县城及其附近地区,城内居民伤亡颇重,团长吉星文亦负伤。敌人并于是日占领大井村、五里店等处,截断了北平至卢沟桥的公路。

为了加强卢沟桥一带的兵力,乃于九、十两日先后将驻保定的陈春荣旅之一团、东北军五十三军万福麟部之骑兵团及钢甲车两列开到长辛店一带,计划在十日夜袭丰台之敌。九日晚七时左右,张自忠以电话询问何基沣前线情况后,对何说:“你们要大打,是愚蠢的。如果打起来,有两方面高兴:一方面是共产党,符合了他们的抗日主张;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可以借抗战消灭我们。带兵不怕没有仗打,但是不要为个人去打仗。”何答以“现在的情况,不是我们要打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要打我们。”张感到何的意志坚决,不易说服,而自己又不是何的直接长官,于是就叫军部给何发布命令,严令“只许抵抗,不许出击”。

本来何已经商得冯治安的同意,决定乘敌人大部兵力尚未开到的时候,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出其不意,予丰台之敌以歼灭性的打击,军部命令到达后,这一计划未能实行。从此,卢沟桥的战事和其他方面一样,就完全陷于被动。

三

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即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宣言中说:“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全中国同胞们!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我们要求宋